

第十一屆“神學與人文學”暑期學術 研討班綜述

Review of the 11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米奧蘭

MI Aolan

作者簡介

米奧蘭，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I Aolan, MA Studen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helen.miaolan@ruc.edu.cn

Abstract

From July 6-9, 2015, the 11th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Summer Institute was held at the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Henan province. The theme of this Summer Institute was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rises”. Ten keynote speakers from the US, UK, Israel,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delivered presentations at the Institute. More than 40 young academics from 29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nel papers, discussing and exchanging views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rises”, the scholars presented papers within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lassics, religious studie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Sinology.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jor concerns and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Institute, including the crisis of faith behind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the crisis of interpretation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ecological and identity crises of our current globalized world. The Summer Institute demonstrated the best academic effort to reflect on the modern way of life and to resolve longstanding dilemmas facing humanity.

Keywords: Theology, Humanities, Contemporary Cris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5年7月6日至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與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主辦、河南安陽工學院承辦的第十一屆“神學與人文學”暑期國際研討會於安陽工學院舉辦。來自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格拉斯哥大學、耶魯大學、希伯來大學、馬里蘭洛約拉大學、輔仁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10位專家發表主題演講，並與來自全國29所高校的40餘名青年教師展開學術交流和對話。

在“直面當代危機”（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rises）的主題之下，本屆研討班從東西文化普遍存在的對“神聖”的追求出發，以跨學科、跨文化的比較研究視域探討了當代文明在人類與自然、自我與他者、神聖與世俗、傳統與現代、精神與物質的失衡狀態下的生存之道。與會學者的討論涉及文學批評、比較文學、宗教研究、漢語神學、經典翻譯、漢學研究等多個領域，探討的內容既包括古老的文明衝突、學術論爭、經典詮釋及對“經典化”過程的考察，也包括當代日益凸顯的生態危機、災後重建問題、文化想像與文化身分、消費社會下的信仰真空等問題。旨在通過學術探討反思現代生存方式，為擺脫人類共同面臨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文學批評、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

近年來，文學批評及比較研究越來越關注文本的超驗精神維度。這或許與後現代主義不斷地否定權威、重估意義的“解構”，進而陷入西緒福斯式的困境後重新為主體覓得棲身之所的嘗試有關。借助宗教與神學資源重新探尋蘊藏在文學與人之生存中的神聖追求與現世關懷，或許是所謂文學批評“宗教轉向”的當代意義。

耶魯大學司馬懿（Chloë Starr）教授的《史鐵生與當代知識分

子信仰的半影》(Shi Tiesheng,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Penumbra of Faith*) 通過分析史鐵生的小說和散文，探討了以史鐵生為代表的同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尋找個體生存意義的歷程。司馬懿認為，史鐵生關於人性、苦難、愛的思索與基督教神學存在深刻共鳴，但不應將其局限在基督教神學的理論框架之中。他對科學理性和權威的質疑、對個體的人的肯定和關注，以及對苦難的意義的思索在當代中國語境乃至不同文化所共同面對的當代危機中都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索。劉燕的《十字架上的叩問與告白——解讀王桂林的組詩〈我的耶路撒冷〉》從“我—你”對話的視角闡釋了當代詩人王桂林《我的耶路撒冷》組詩中用呼告、仰望靠近上帝的嘗試。梁新軍的《海子詩歌的神學向度及其意義》結合具體文本，分析了海子詩歌在“反客為主”的詩歌模式、“火”的意象、詩歌中的“天堂情節”及“傾空自我”的詩學思想四個方面的基督教淵源。

張變革的《幻想的愛與實踐的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創作問題》關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時期作品中對愛的不同表達，並將之歸納為“幻想的愛”與“實踐的愛”。前者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實際上陶醉於自我，指向抽象的“概括的人”，甚至會發展為對人的奴役。“實踐的愛”是陀氏在揭示了幻想的愛對愛的扭曲的同時提出的構建前景，即肯定信仰、消除自我。

如果說陀氏的東正教信仰是理解其詩學與精神氣質的入口，那麼現代西方作家則是在對宗教普遍質疑的背景下書寫人類在現代危機下的“宗教性”體驗。秦燁的《末世·危機·救贖——以〈五號屠場〉與〈世界末日之戰〉為中心》分析了兩部20世紀的戰爭主題小說《五號屠場》與《世界末日之戰》中末世形態的呈現樣態，並援引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的“生存神學”，發掘末世敘事中的對話性、延續與重啟。朱翠鳳的《“神學”的叛逆與美國地方書寫傳統》從生態批評的角度探究美國地方書寫與基督教傳統的關係，追溯了托馬斯·傑弗遜、愛默生、杜威三個重要地方書寫作家如何“改造”

傳統的基督教義，使之關注的重點由不可見的靈魂及天堂轉向可見的自然及地方書寫。

自蘇格拉底時期以來，詩與哲學之間難以調和的張力就成為了被人們反覆討論的命題。這場論爭在二十世紀的哲學、宗教和社會背景下獲得了新的語境。姜林靜的《愁苦中的期待？——詩人魏斯和他通過思想家施米特產生的波瀾》以及陳芸的《“神話詩學的回轉”？——論伽達默爾對〈杜伊諾哀歌〉的詮釋》討論了20世紀超驗的詩性語言與哲學思想的互釋。前者解讀了卡爾·施米特對詩人康拉德·魏斯推崇備至的原因，即二人在世俗的“語”與超驗的“言”、在現實的“愁苦”與信仰的“盼望”之間的共鳴。後者集中梳理了伽達默爾對《杜伊諾哀歌》的闡釋。陳芸認為，伽達默爾詮釋思路的核心是“神話詩學的回轉”，即擱置古代神話傳統和基督教理念，回到“自我理解”，發現裏爾克詩歌與神話、宗教的相關性，而非將詩文視為神話的再生或演繹。

對“他者”的關注和對單一立場和身分的挑戰，是宗教研究與比較文學共享的品質。由此催生的關於文化想像與文化身分的結構性分析使人們得以從社會、歷史等不同角度重新審視經典文學作品。王濤的《從居室廳堂走向百貨商店的女性——從左拉文學世界看女性消費群體的一次遷變》將左拉作品中的“家常瑣事”納入消費主義、女性身分、資本主義的大背景下考察。王濤結合凡勃倫、布羅代爾等人的資本主義批評及僑易學理論，認為左拉作品裏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炫耀式消費依然是為其丈夫彰顯身分的“越位消費”，巴黎女性的時尚風潮實際是階層劃分的產物，是較低階層對較高階層的“仿變”與彰顯本階級共性的“仿常”的矛盾統一體，消費的女性成為了時尚的主人，卻並非自己的主人。

二、宗教研究與漢語神學

隨着人類用理性工具對世界的不斷“祛魅”，習俗和傳統價值失去了其終極和普遍意義。消費文化使人們的追求轉向世俗世界，現代人僅依憑“當下”難以覓得長久的生存意義。在缺乏普遍價值和倫理的當代社會，正如德國神學家孔漢斯（Hans Küng）在世界倫理宣言中所說，“我們的世界正經歷着一場根本危機（a fundamental crisis），即全球性的經濟、生態與政治危機。”^①人類正普遍意識到意義的失落與現代文化的局限，重新回到對神聖意義的發掘上來。而宗教，作為對人類生存意義的深層次思考，當如何面對當今全球處境，走出各宗教間真理問題上的排他性，為人類社會提供一種積極的聚合力量。

來自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戴維斯教授（Anthony Oliver Davies）的發言《當今世界需要何種神學思想？》（*What Kind of Theology does the World Need Today?*）回顧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從生物進化論、社會認知學的角度思考了基督教成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宗教的可能性。戴維斯認為，要實現人類的融合，需要我們把語言視作具有對話性的、人道的，求同的中介，而非物化他人的工具。基於這一文化設想，戴維斯建議重新思考已有的宗教實踐，關注基礎神學而非宗派鬥爭，重新發掘上帝的“體現”（embodiment）所具有的潛能。

格拉斯哥大學的紐蘭茲教授（George Newlands）在本期研討會的兩次報告《人文精神與好客精神》（*Humane Spirit-Hospitable Spirit*）與《當代危機：精神、城市與垂直型城市》（*Contemporary Crises: the Spirit and the Vertical City*）均關注基督教在現代社會的角色。前者探討基督教

^① 世界宗教會議《世界倫理宣言》，芝加哥，1993年9月4日。[“The Declaration of a Global Ethics,” prepared by 200 scholars and presented at the 1993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held in Chicago, IL on September 4, 1993. Se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parliame.htm>.]

的“好客”（hospitality）如何在現代社會的宗教和世俗維度發揮積極作用。紐蘭茲認為，“神聖的好客”不僅限於基督教和基督教堂，它也是不同社會、經濟、宗教，文化共享的理想。在《當代危機：精神、城市與垂直型城市》中，紐蘭茲站在西方基督教信仰者的視角，結合個人的中國經驗，探討基督教“聖靈”如何在中國這一“垂直型城市”發揮作用。紐蘭茲建議不拘泥於所謂正典或權威去理解聖靈，而是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傾聽東方文化和宗教的聲音。

在漢語學術語境中，漢語神學學者帶着自己的問題意識在基督教思想中尋找資源以建構自身的學術體系，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資源構成了與基督教神學呼應的獨特原素。曾慶豹的《中華現代性的危機——漢語批判神學與中國新左派的隱匿對話》旨在引導學界正視現代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存在過，但長期被主張“救亡”和“民族主義”的中國主流思想所排斥的一種左派基督教思想。曾慶豹從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以汪暉為代表的中國新左派思想，並以現代中國基督教思想中的激進主義為資源展開對話，考察民國文人如吳雷川、沈嗣莊、張仕章、謝扶雅、吳耀宗等如何以一種相似於“左派基督教”或“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姿態回應來自現代性的挑戰。

宗教學研究不僅是人類追尋生存意義的途徑，也是理解人與自然關係的中介。香港中文大學的學愚教授的發言《心靜則國土靜——佛教對當代生態危機的回應》以大乘佛教唯心淨土的理論依據“心靜則國土淨”作為生態環保實踐的理論基礎，介紹了佛教中提倡人類與自然共體共生的關係。寧欣的《上帝、自然與人：環境危機時代的生態主義神學》梳理了現代生態主義不同流派對傳統基督教神學“人類中心主義”的批評，介紹了三位當代基督教神學學者（Sallie McFague、Gordon Kufman、Anna Case-Winters）如何打破上帝與世界的懸絕，重構上帝、自然與人類關係的生態主義神學嘗試，並對生態主義神學給予反思。

除此之外，不少學者通過重讀和重釋基督教經典，探索神學

與人文學互動的文化與歷史意義。希伯來大學的惠特曼教授（Jon Whitman）的《信仰危機與實踐危機：作為想像文學作品的聖經》（*Crisis of Faith, Crises of Fulfillment: Sacred Scripture as Imaginative Literature*）通過分析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薄伽丘、錫德尼（Philip Sidney）、赫爾德（J. G. Herder）以及巴爾（James Barr）等人對《聖經》與文學作品的論述，揭示了歷史上《聖經》與文學互動的趨勢：即基督教通過文學批評將《聖經》主題和術語與普遍意義上的文學關聯起來。這不僅顯示了耶路撒冷與雅典的密切關聯，也為人們理解今天的東西方關係提供了啟示。孟振華的《用宗教經典回應當下危機——以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參孫〉（*Samson*）與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獅子蜜〉（*Lion's Honey: the Myth of Samson*）為例》通過解讀兩部20世紀猶太知識分子對於參孫故事的演繹，展示了宗教經典的重釋與猶太歷史問題的互動。歐振華的《夏娃，“肋骨”或是平等被造的伙伴？——試析猶太女性主義者對〈創世記〉1-3章夏娃來源叙事拉比釋經的批判》重新考察經典拉比時期文獻《大創世紀》、《巴比倫塔木德》中的夏娃來源問題，認為以朱迪斯·巴斯金（Judith Baskin）為代表的猶太女性主義者視拉比傳統否認女性本質地位的判斷有失偏頗。

無論是勦力解構傳統形而上學、神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抑或乞靈於超驗與信仰，神學與現代人文學研究的互動從未間斷。林子淳的《神義的忿怒與人義的激情——從洛維特·布魯門貝格論爭到古今靈知論糾紛》回溯半個世紀前洛維特與布魯門貝格之間關於現代性源起的經典爭論，着重考察了其中有關靈知論的問題在學界中如何引發巨大回響。林子淳認為，儘管洛維特和布魯門貝格對現代性歷史哲學的病理學分析不盡相同，但二者都將整個現代性追索推向早期基督教教義形成的階段，這一共同的關注引發了近代對廣義靈知論的探索。林子淳注意到了當代對靈知論的關注與海德格爾所代表的存在主義思想之間千絲萬縷的學術譜系聯繫。林子淳認為，洛維特和布魯門貝格爭

論不僅是一場關乎宗教的學術論證，其背後是“正義”和“歷史中的道義”的問題。無論矗立於東方還是西方，人類與歷史道義之間的辯證是每一代人不斷探尋的課題。

此外，宋旭紅的《視覺、神性與圖像——試論西方古典時代視覺中心主義的起源》回溯了西方“視覺中心主義”形成的過程，認為視覺中心主義雖然肇始於柏拉圖的“洞穴比喻”，但人類的視覺與神聖的真理之間的真正聯通是通過《聖經》傳統而實現的。陳影的論文《“猶太人問題”中“宗教”與“世俗”的維度》認為鮑威爾與馬克思論述猶太人問題的宗教和世俗化語境並非涇渭分明，二者爭論的實質是人類獲得自由、實現解放的途徑。鄭鵬的《福柯的宗教意義》一文梳理了學界對福柯宗教學的三種主流研究視角：福柯與否定神學、福柯與後現代神學、福柯與女性神學，並着力辨析了否定神學視野下福柯的宗教意義。劉子楨《從自然接受到批判揚棄——克爾凱郭爾生存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係》梳理了克爾凱郭爾生存辯證法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關係，認為克爾凱郭爾的生存辯證法是對黑格爾思維辯證法內容在宗教和倫理領域的適用性的否定，同時亦是對黑格爾辯證法思維形式的繼承。

三、經典翻譯與漢學研究

神學和人文學之間的互動不僅是一種跨學科研究的範例，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加強對自身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徑。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的報告《“對極結構”（polarity）與“間距關係”（écart）——“金律”與“中庸”的雙向解釋》通過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對《論語》“金律”的譯解與法國哲學家於連對“中庸”的闡發，探索如何通過中西交流概念工具的轉化，重新揭示被表面的一致或差異所掩蓋的東西話語的互釋潛力。楊慧林指出，理雅各對《論語》中兩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翻譯沒有被“肯定式”與“否定式”的糾結所限，而是依

據語境分別對“仁”與“恕”作了不同的翻譯處理，同時將基督教的邏輯隱含其中。而於連則從西方外部的角度反觀中國，將“中庸”理解為“種種極端之間的可能平衡”，從“間距關係”的角度為“不能精密譯之”的中國概念帶來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這啟發我們，不同文化間的對話不必塗抹分歧，也無需達成似是而非的表面一致，由自身視角出發的對“差異”的發現與深入思索，或許才真正有助於實現文化的理解與共存。

姜哲的《漢學與經學的互動——以〈論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的英譯與詮釋為例》和丁大剛的《辜鴻銘〈中庸〉英譯文的現實關懷》均關注了中國古代經典的翻譯問題。前者梳理了馬士曼（Joshua Marshman）、詹寧斯（William Jennings）、理雅各（James Legg）、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等西方漢學家對《論語》中“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一句的爭論，即將“復”字理解為“反覆”與“踐言”兩種主張。姜哲認為，西方漢學界對“言可復也”等經學問題的討論，促使在中國傳統經學中由於自身語言的同質性而緩解的問題以一種極為“醒目”的方式重新引起本土學者的關注，使經學得以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審視自身。丁大剛借助福柯的話語概念，提出了“翻譯話語”與“非翻譯話語”的系統區分及譯者話語的功能，並着重強調了“非翻譯話語”對理解譯者思想的重要性，並以辜鴻銘《中庸》英譯本為例探討了譯者話語功能在文本中的實現。

來華傳教士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在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關注。高志強的論文《教育、出版及翻譯：馬禮遜與理雅各時代作為東西方橋梁的英華學校》通過詳細的史料考察，從教育、出版、翻譯三個方面介紹了理雅各和馬禮遜時期英華書院對東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李海英《近代西人漢語研究著述中的版本問題》結合一手海外漢學文獻，針對近代西方漢語研究著述中譯名不同、著者不同、文不對題、版次差異等版本問題加以甄別，考訂了十餘部較為重要的海外漢學著作的書名、譯名及版次，幫助把握文獻的基本內容和譜系關係。劉樸兵的《利瑪竇

視野中的晚明飲食文化》從食物、宴飲活動、宗教飲食習俗等角度整理了晚明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的遺著《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關於中國飲食文化的記載，說明西方傳教士從他者視角對中國飲食文化的觀察與記述，對考據中國飲食文化提供了珍貴的素材。劉麗霞《從〈中國叢報〉看近代來華傳教士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譯介》基於對原始資料的考察與細讀，分析了中國近代重要的英文期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5-1851.12）刊載的英譯中國歷史演義小說、神怪小說、世情小說，並分析了其譯介目的和翻譯策略。

本屆暑期國際研討班延續了跨文化、跨學科比較研究視域，從“神學與人文學”視角反思當代危機，通過學術思索為人類擺脫共同困境做出了有益的嘗試。